

当 · 代 · 著 · 名 · 学 · 者 · 自 · 选 · 集

王春瑜卷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古今集

1200317151 - 2



1200317151

福州大学  
图书馆

当 · 代 · 著 · 名 · 学 · 者 · 自 · 选 · 集

# 古今集

k248.07  
809



王春瑜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王春瑜卷:古今集/王春瑜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ISBN 7-311-02083-2

I. 当... II. 王...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王春瑜—文集③中国—历史—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062 号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王春瑜卷**

**古 今 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

兰州市残联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5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8 千字

印数:1~5000 册

---

ISBN7-311-02083-2

全套定价:180.00 元  
(共十册)

## “丛书”总序

---

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克非先生对我说，要为六十岁以上、七十岁左右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出版一套人文社会科学论著自选集。其中，史学类要我帮忙编选十卷一辑。我想，这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八十岁上下的大学者，多有出版家为他们周密策划出书事宜。有的大学者的文集、文选不知重复出版了多少套，而六七十岁的少名或无名的“青年老头”却少有人来问津。说穿了是因为后者的著作不能为出版者赚钱，甚至还要蚀本。第二，是有官衔的“学者”，因为有权势在手，不管他有学问没学问，也有办法（例如用公款支付出版费用，甚至公然买书号）令出版社为自己出文集、文选。据我所知，某些“长”字号的此类书籍，就是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版的。即使没有人买没有人读，他们也会贸然送人，到处张扬。这两条理由，不知道克非先生是否认同，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兰州大学出版社的盛情，令我感动和钦佩，因而不辞自身学识之浅陋，当即答应为他们选荐作者。出版社的标准就是我的选介标准：只问学问，不问官职；只选六十至七十岁之间或略大于

七十岁的学者。这时，我不由想起季羨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一段话：

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有很大不同的。科学技术专家，一到六七十岁退休的年龄，有的耳有点不聪，有的目有点不明，难以再进实验室，拿手术刀手也发颤，只好退而且休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家，则到了这样的年龄却是如日中天，正是读书写作的大好时候。即使耳目有点小毛病，甚至大毛病，也无大碍。此时，他们书读得越来越多了，知人论事的能力越来越强了，通古今之变的本领越来越高了，究天人之际的愿望越来越旺了，即使遵章退休，也往往是退而不休。

我完全赞同季老的高论，且有所补充。照我看，中国的六七十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大多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上坎坷多难，饱经风雨沧桑，不乏伤心切肤之痛。然而，他们从未颓唐不振，反而因为心灵深处拥有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独立思考 and 敢于重新评估一切的怀疑精神，使他们晚年生活追求中始终不曾忘却对人文社会科学尽自己一份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他们虽面对权威和虚假，却甘于清贫和寂寞，以信念、醒悟和批评，诉求真实，尊重歧异，鄙弃教条，质疑权威，敢于应对非学术因素干扰下学术领域的种种挑战。

我的专业是研究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史，所知只有一百多年的史事，而对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则知之甚少。不负所托，为了审慎地选荐丛书各卷作者，我便向这两个学科的专家和老朋友请教。世界史，我请教于苏俄史专家陈之骅先生；中国古代史，我请教于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之骅谦虚地说他自己的文章暂时没有时间整理，他诚恳地推荐英国史专家王章辉先生，王先生欣然俯允。春瑜除承诺自编一卷外，又热心推荐汉唐史专家张泽咸

先生、宋辽金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张、王两先生亦积极响应。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我敦请王桢林、张注洪、马连儒、唐宝林四位先生予以支持。桢林先生以主编《中国现代史》（高校教科书）、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抗日战争史而名满学界。注洪先生以研究中国现代史科学与信息学而著称。马连儒编审主持《人物》杂志多年，对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研究既深且精。唐宝林研究员近二十年间以研究陈独秀和托派历史知名于海内外。在以上八位先生的选荐过程中，我始终在寻找马大正先生。他是边疆史地和少数民族史专家，我虽不研究边疆史地，但一向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大正其时正在新疆考察，直到一个月后才联通敲定。

九位先生中，六位是旧雨，三位是新朋且从未见面。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汉、唐、宋、辽、金、明、清、民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和英国史诸学科。我稟性愚鲁，才疏学浅，对上述许多领域相当外行，不敢妄评诸公学术成果，但据平时涉猎，参照学界品评，我深信他们都是各自学科中的一流学者。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他们以其非凡的学术成果为本学科作出了独特的有些是无可替代的学术贡献。这种贡献的深层意义，在于他们摆脱了长期流行并主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二元思维定势”，即非好即坏、非美即丑、非善即恶的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人们可以见仁见智，乐山乐水，可以提出种种批评见解，但在学德和文品上，他们绝不会愧对广大读者，这就是：

——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是无所禁忌，秉笔直书，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

——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信史，是史镜，而非“胜利者的宣传”。

我坚信，这应当是时下和未来历史学主体和客体的正确的发

展方向。这也是高悬于我和所有作者面前的崇高的目标，追求之心不敢稍懈。

陈铁健

壬午谷雨後四日，京東亮馬河畔水南齋

## 代序/今古何妨一线牵

---

说来惭愧，史学上的今与古这个似乎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曾经在很长时期内，使我感到迷惘、困惑，甚至痛苦。

“回首当年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童年时，正值抗战军兴，我随母亲、长兄从苏州逃亡至原籍乡间。在穷乡僻壤，最早给我留下古的模糊概念的，是搭草台演出的江淮戏。那时的淮戏，还属于民间小戏，有的戏班子完全是由农民中的淮戏爱好者组成的，农闲时演出，农忙时各自回家耕耘、收获。记得有一年初冬时节，在一个叫吕老舍的村庄，我头一次看淮戏，在惊叹斑斓彩衣、绝代佳人（按：当时我不过五六岁，根本不懂戏装、化妆术之类）之余，随着《活捉张三郎》、《三击掌》剧情的发展，我不禁困惑起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问大人，谁也不知道。回去问母亲，她正在做饭，一边用火叉拨着炉膛里的柴草，一边微笑着说：“咳，管那个做啥呀？反正是古时候的事罢了！”从此，在我的心目中，古的概念，像遥远的夜空，神奇而又迷茫。大约又隔了二年，这时我已经在小学读了二年书了，因病卧床，偶然得到村邻借阅的连环画《隋唐演义》，这可说是我平生阅读的头一本通俗史学读物。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真是爱不



释手。但是，读着，读着，问题又来了：隋唐离现在有多远？为什么现在看不见李元霸、秦叔宝、程咬金、史大奈这类人呢？这一回，我向教师请教，他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不知道离现在到底多少年，反正有千把年了吧！秦叔宝、程咬金这些人是古人，是大英雄，今天的人都平平常常的，当然找不到这类人了。”这是我第一次有了“往事越千年”的概念，比起过去的混沌一片，时空上总算有了比较明晰的轮廓。但是，我也从老师的谆谆教导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今人不及古人。我甚至恼恨生在当今之世，倘若生在一千年前，不是就可以一睹瓦岗赛里众英雄的丰采，并跟在他们身后摇旗呐喊了吗？越想越感到晦气。虽然如此，毕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此后我千方百计找旧小说来读，诸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精忠说岳》、《水浒》、《三国演义》等等，几乎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苦读”的结果，一方面我终于慢慢明白了朝代的顺序，古的概念再不是抽象、模糊的了。但是，我常常感到，以今视古，胜过“巡天遥看一千河”，仍然充满了神秘色彩，平添了几多感慨，几分惆怅。

我写这一些，决不是未老先衰，离题万里，要读者跟我一起去怀旧，重拾童年的残梦。不，我只是想说，童年时我在今、古上的幼稚、朦胧、困惑，成了我后来习历史的起点，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这是我在多梦的童年、少年时代始所未料的。

也许更使我惭愧的是，等我长大，在复旦历史系读了五年书，又念完了研究生的元明清史专业，虽然有时依然如“童梦成真”，思索史学研究中的今与古问题，但并没有深入地、刻苦地研究与思考，以粗知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满足，并抄下来，贴在床头。至于如何“通古今之变”？实际上根本茫然不知。尽管在求学期间，政治运动不断，但我珍惜放牛娃出身，父兄的汗水钱来之不易，仍然读了大量的书，我的借书

证，换过好几本。不过，我几乎完全埋首在具体的史实里，对今——现实，对古——过去，很少甚至没有作连贯的纵向思考及横向的比较、剖析，其结果，必然是既不知今，也不知古。因此，在此期间，我不仅在史学上没像样的成绩可言，更重要的——而且痛心疾首的是，很快在政治上栽了大筋头。当“文革”的红色狂飚从神州大地上呼啸而起时，曾有朋友告诫我说：“别参加，肯定要秋后算账的！1957年的教训，不能忘记。”但我没听进去，更没有去回顾中国政治史，特别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史，却怀着对已被打着新旗号的造神运动捧成“红太阳”的赤诚，深深卷进文革，落个当了近7年的反革命、家破人亡的境地。1968年春、秋，1970年冬，我曾三次身陷囹圄。在丧失自由的痛苦日子里，我在心中重温历史，认识现实，也就是把古与今紧密地连系在一起，苦苦探索，终于在今古之间，混沌初开，认定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空前的封建专制主义招魂运动。在受政治迫害的日子里，虽然被批斗、训斥，是家常便饭，被勒令示众、打扫厕所等等，更是司空见惯，但我从未想到自杀，从未丧失对未来的憧憬。因为这时我已懂得察古知今，眼前的种种政治把戏，没有一样不是古代封建专制主义的翻版。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重获自由。亡友杨廷福教授（1924～1984）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曾在无人时，长叹一声对我说：“你戴的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比‘右派分子’的帽子重多了。你现在是‘潜龙在渊’，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龙飞九五’呢。”老大哥的关怀使我感动，也使我茫然。但是，痛定思痛，我终于下定决心：只要有一天我重见天日，一定认真做挖“文革”“祖坟”的工作！

皇天不负苦心人，“不信东风唤不回”。1977年4月，我终于由上海市公安局彻底平反。我重新拿起了笔。

据说，“文革”中因各种政治案件而受株连的人，有二亿多。在这个巨大的数字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与泪！我妻过校元女士（1937~1970）、一位年青的物理学者，就是因我而株连被迫害致死的。难道还有比自己的亲人死于非命更惨痛的吗？怀着悲愤，我写出了《“株连九族”考》<sup>①</sup>。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写道：“明清之际有句俗话说：‘从死地走一回，胜学道三十年。’血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坚决荡涤封建专制主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应当把‘株连九族’这具封建僵尸，永远深埋在历史的坟墓之中！”显然，倘若我未在“文革”中“从死地走一回”，就不会对“株连九族”的历史及现状有这样深切的认识。明明是疯狂的政治迫害，却一切都在“革命”的词藻下，在“万岁”之声不绝于耳的热潮中进行的。我参加打倒别人的大会，跟着大家一起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在打倒我的大会上，也是一片“万岁”声，如歌如潮。在这场批斗会上，又有人训斥我：“你怎么不跟着叫‘万岁’？！”而在另一场批斗会上，有人斥责我：“你是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资格喊‘万岁’？！”呜呼，这时我才懂得了，“万岁”，“万岁”，“思不出其位”。1978年下半年至1979年春天，我陆陆续续搜集历史上“万岁”的资料，考察“万岁”的来龙去脉，终于写出了曾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万岁”考》<sup>②</sup>，不仅不少省的内刊转载了这篇文章，后来《新华文摘》及海外的

---

① 刊于《文汇报》1979年2月16日，《新华文摘》1979年第3期转载。后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拙作《吹牛考》亦入选。

② 初稿草成于1979年5月24日，8月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作组主办的内部刊物第34期发表。后公开刊于《历史研究》同年第9期。对此文有兴趣的读者，最好参看拙著《“土地庙”随笔》中的《“万岁”考》，特别是文末的附识。

《大公报》等报刊也转载了此文，台湾的《中国时报》还专门发了一条消息。这些年来，与海外学术界同行交往日多，有好几位朋友都说读过此文，并谬承夸奖。一个真正的有良知的史学家，他的脉搏，应当与时代、人民的脉搏跳动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反映人民心声、触动时代敏感神经的作品。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几十年前，虽严冬已过，但残雪犹存，真个是“乍暖还寒时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倘没有一些好友的鼓励，我未必有足够的把握将文章面世。杨廷福学长当时客居中华书局，我们不时小聚，他不仅极力怂恿我写《“万岁”考》，还提供过几条材料。文章成篇后，征求意见时，许多人都劝我不要发表，说文章太尖锐了。可是，我寄给在廷福兄介绍下得以结识、并成为好友的著名学者冯其庸教授，他很快就来信说，收到此文后，他连夜快读一遍，觉得写得很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连浮数大白！”而《未定稿》的编辑李凌、王小强同志，收到我的文章后，很快就打来电话，说用最快速度发表，从此我们并成为好友。“独学无朋则不乐”。作为今人，倘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遗世独立”，很可能没有胆量面对严峻的现实，也就不可能率先去打破史学禁区，理直气壮地面对古人。继《“万岁”考》之后，我又陆续地写了《烧书考》、《吹牛考》、《语录考》、《说“天地君亲师”》等文章，社会反响是好的，以后这些文章收入《“土地庙”随笔》<sup>①</sup>。从《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大公报》的书评看来，读者最感兴趣的，仍然是这些文章。

当然，这些文章，都不过是读史札记，或历史杂文，对史料的搜集、诠释，远非尽善尽美。但重要的是，我写出了我心中的话，写出了今人迫切想了解古代有关此类问题的知识，写出了一

<sup>①</sup>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些史家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就此而论，我觉得没有在史学界白活，没有对不起中国古代史这个饭碗。

在实践中，我终于逐渐明白，作为史学家，如何处理今与古的关系？结论应当是：今古何妨一线牵。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出版的专著、小册子，发表的论文、读史札记、随笔、杂文，大体上都贯穿了这条线索。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在清理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垃圾，深挖其历史与现实的土壤。有的文章从标题上就可看出内容，如《阿Q先辈考略》<sup>①</sup>；而大多数的著述，有心人自能从中领悟到我对现实中种种历史流毒的针砭。

当然，今古一线牵，并不是新的史学方法，更不是我的创造。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可以说在逻辑上已经包含了今古一线牵的命题。读过《史记》及《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的人都能深刻感受到，他倘若不是对今、古两头都有深刻的理解，特别在蚕室中遭受奇耻大辱，他不可能写出那样有血有肉、传诵千秋的史学巨著。一部中国史学发展史足以证明，很难设想，一个对社会现实冷漠、稀里糊涂的人，能够理清清楚古代历史纷繁的脉络。古人司马光等不必论矣，近代的史学大师梁启超、郭沫若等，在史学实践中熔古今于一炉的辉煌业绩，更是尽人皆知的。

显然，不学如我，今古何妨一线牵，不过是跟在史学大师身后学步、描红而已。虽然学无成，鬓已秋，但聊堪自慰的是：自知只有中人之智，治史未敢偷懒，文章不论长短，皆心血之痕，从不掺水；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头插风向标，曲学阿世，深知良心不能论斤两，否则有何资格评说古人；坚持史学研究的理性、

---

<sup>①</sup> 曾以《阿Q的祖先》为题刊于台湾《自由时报》1990年2月22日，后增改，易题《阿Q先辈考略》，刊于《中国文化报》1990年5月2日。

科学性，坚决摒弃“四人帮”的“梁效”、“罗思鼎”那种混淆古今、既歪曲古、也歪曲今的帮派史学。

该结束本文了，依然心潮难平。忽然想起南宋词人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似有所悟，现活剥一首，用以述怀，自属“油坊”作品，平仄非所计也——

少年闻史戏台上，  
古今糊涂账。  
壮年读史忧患中，  
浦江呜咽神州泣西风。  
而今治史燕山下，  
鬓已染霜花。  
千古兴亡总无情，  
一线贯穿历历看分明！

（载于萧黎主编《我的史学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 代序/艰难明清走一回

---

“潇洒走一回”，这句歌词现在成了常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口头禅。而对我这个捧着碗向二三百年前，甚至是几千年前的古人讨饭的佣书者来说，从来就没有如此轻松、洒脱的感觉。大文豪东坡老先生在《和子由澠池怀旧》诗中有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诗补注》卷三。春雨斋刻本）收在这本《明清史散论》中的芜文，也不过是不才在研究明清史路途中留下的“雪泥鸿爪”而已。其实，说得直白一点，恐怕借用我去年初在《文汇报》上刊出的蹩脚文章《雪泥鸡爪》来比喻，要更贴切些。我本文人，脑子里难免“野豁豁”，或者用附庸风雅的话来说，形象思维比较发达。但是，研究历史，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需以实证为前提，“步步为营”，这与鸡啄食时用爪子刨一下，啄一下，“去芜存精”，食可食之物，慢慢积累，实在是颇为相似的。

细说起来，我端上研究明清史的饭碗，纯属偶然。1955年我考大学时，一心想进新闻系，却录取在历史系。当初要是进了新闻系，也许我今天的命运会是另外一番情景，至少不会埋首在故纸堆，也不会在“文革”时被“四人帮”的打手大大抬举：“你说的以古讽今的黑话，写的黑文，可以出一本书了！”不过，正如前贤朱贤《续偶然诗》所说：“世间多少偶然事，要到偶然

不偶然。”（明·余永麟：《北窗琐语》第16页。丛书集成初编本）且不说文史本来是一家，倘有看过拙作《今古何妨一线牵》（原刊《光明日报》1993年11月8日第3版，后收入拙著《阿Q的祖先——老牛堂随笔》。团结出版社，1993年）的朋友就可以知道，早在浑沌初开的童年，我从草台戏、小人书中就接受了历史知识的启蒙教育。历史与我，也确有难解的情结。1960年，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留校当研究生，专攻中国农民战争史。后有司调整专业方向，我改读元明清史专业，拜师于陈守实（1893~1974）教授门下。陈师是位严师。他对我的指导，除了听他开的“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这门课外，便是参加由他主持的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的学术活动，也可登门向他请教。平时他并不过问我看些什么书，写什么文章。但是，他一贯强调，要精通理论，要系统掌握第一手资料，文章要有新意。他要求每学期都要交一篇文章给他看，有好说好，有歹说歹；说歹时毫不留情，而且我还真有一篇自鸣得意的文章，被他当头棒喝。陈师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严谨二字。自问在他的熏陶下，虽然下笔不可能像他老人家那样千锤百炼，而且对发表慎之又慎。但撰文不论长短，从不敢拆烂污、人云亦云，免得有辱师门，这是我敢断言的。鉴于我无心啃洋文，特别是学蒙古文求师无门，这对于研究元蒙史来说，难免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虞，我放弃了元史，专攻明清史。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读了《明史》、部分《明实录》、不少明人文集、笔记；读了《清史列传》、部分《东华录》及数量可观的清初人文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如程先贞的《海右陈人集》、王宏撰的《山志》等，都是复旦图书馆的珍藏本，有些书，过去从来无人问津，我还是第一个借出来，掸去书套上的灰尘。阅读时，除了摘录有价值的史料外，我更重视以专题研究来带动阅读，向纵深发展。除了毕业论



文外，我已成篇的学术论文就有《论方国珍》、《论元末农民战争与宗教》、《〈日知录〉剖析》、《论蔡牵活动的性质》、《论氏族公社残余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闪现》等等。可惜的是，在我顺利通过研究生论文答辩，走上工作岗位不久，还来不及将这些论文交刊物发表，“四清”运动来了，“十年浩劫”来了，“左”风狂热到六亿神州尽“顺摇”的地步，随着我的被打倒、践踏，我在求学期间辛苦积累的资料、写成的文章，都被抄得一千二净，化为冷烟寒灰。因此，等我重新研究明清史，那已是1978年以后的事，等于是重新白手起家。

明代学者谢肇淛曾尖锐批评当时的史学：“今之作史，既无包罗千古之见，又无飞扬生动之笔，只据朝政、家乘，少加润色，叙事惟恐有遗，立论惟恐矛盾，步步回顾，字字无余，以之谀墓且不堪，况称史哉！”（《五杂俎》卷13，“事部”一，中华书局刊本）不幸的是，虽说已相隔几百年，如果拿这些话来批评当今的史学界，也还是切中时弊的。

治史的过程，是个长期积累的渐进的过程。倘有朝一日，无奇不有的神州大地上，突然冒出个20岁的大史学家，必定是骗子无疑。今日史学界，五花八门。写本把书、混个芝麻绿豆大学官，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对史学前辈指手划脚者有之；不过懂点冷门，却被捧成“超天才”，名声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者有之；热衷于出风头，妄想当所谓学科领袖者有之；看到东西洋人便顿觉自己矮几分者有之。如此等等。我虽不学，所幸还与此辈所谓大学者有别，在有生之年，当继续像我的生肖——老牛一样，在明清史学园地默默地耕耘。

1994年12月4日晚于京西八角村老牛堂

（刊于拙著《明清史散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

并刊于《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有删节）